

健全重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

幸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重大任务,要求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理念,深化重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改革,让历史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成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加快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市。

坚定文化自信,勇担新的文化使命。重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底蕴深厚、文脉久远,文化遗产富集。全市共登录不可移动文物近2.6万处、可移动文物148.2万件、非遗代表性项目5170项。保护好传承好这些珍贵文化遗产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全市文化遗产事业改革发展取得很大突破。但同时,还存在文化遗产保护责任落实不到位、文物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基层文化遗产保护力量薄弱、文物科技创新体系尚不完善、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水平还不高等问题。推动全市文化遗产事业改革发展,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自觉把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放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重要位置来推进,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保护与发展、保护与开发等重要关系,着力统筹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着力培育特色文化新标识,着力激发历史文化新活力,着力构建保护发展新格局,建成系统完整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让沉睡的文化资源活起来,延续城市文脉、厚植城市底蕴,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一座“穿千年文脉”的文化强市。

构建统一监管的体制机制,提升文化遗产监管效能。立足实现系统集成、形成完整生态,整合现有文化遗产保护和监管力量,推动文化遗产统一监管,从根本上解决文化遗产事业存在的碎片化等突出问题,筑牢文化遗产保护安全屏障。推动建立协调机制,按照党政同责原则,推动建立市级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机制,全面落实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主体责任,着力破解衔接不畅等问题,推动各职能部门“按职责做好相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优化管理机制,探索采取划归产权、委托管理等多种方式,开展闲置国有文物建筑统筹管理利用试点。针对私人所有且无力保护的文物建筑,鼓励属地政府通过置换、回购等方式纳入统一管理。开展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活化利用试点。建立健全非保护类机制,完善非保护类体系。建立健全评价机制。依法依规推动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纳入干部教育培训体系,考核评价体系,推动建立健全领导干部文化遗产保护责任制。发挥好“文化报表”的作用,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纳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巡视督查,在文明创建等工作中强化文化遗产保护要求。

加强系统性保护、完整性保护,全力守护好历史文化根脉。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以文物资源为核心,整体保护文物本体和改善周边环境,合理保存传统文化生态,协同推进文物古迹、古老建筑、名城名镇、历史街区、传统村落、文化景观、非遗民俗等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文化遗产。适时启动文物保护法重庆实施办法和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修订工作,制订文物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定期组织开展区县政府履行文物保护责任评估,完善文物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社会监督等机制,加强保护督察与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关联动,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真正让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不能挑战的国家意志。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坚持“应查尽查”“应保尽保”,高质量做好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建立全市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目录和三级非遗名录体系。深入实施革命文物保护传承工程、三峡文物保护利用工程、石窟寺保护利用工程。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培养力度。统筹文化遗产保护和城乡建设发展。推动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率达到100%,将各类遗产的保护管理纳入市、区县国土空间“一张图”达到100%。加强基本建设中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全面落实中心城区“用地清单制”文物考古前置改革,完



世界文化遗产——重庆大足石刻



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鹤梁题刻

善“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制度和配套措施。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遗产“活起来”。实施标志性、牵引性工程,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着力打造具有重庆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标志性成果。加强考古和历史研究,建好用好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系统开展重庆地域特色文化研究,挖掘提炼重庆文化物化标识。深入推进“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巴蜀文明进程研究”和“蜀道考古研究”,推动川渝宋元山城遗址考古研究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拓展文化遗产传承途径,建好用好红岩文化公园、长江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长江三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加快推进市级重点文博设施建设,创建武陵山区(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巴蜀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构建融入生产生活的历史文化展示线路、廊道和网络,更好满足人民多样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持续推进涪陵白鹤梁题刻和埃及尼罗尺题刻联合申遗,以及钓鱼城遗址、川渝宋元山城体系、盐业、蜀道等申遗,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实施文旅深度融合。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为统领,打造文博研学精品项目,建设成渝古道、川渝石窟寺等区域性主题主题游径,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利用示范区。发展博物馆IP授权产业,推出特色鲜明的文博文创产品,建设中国文物文化创意产业基地。

强化政策支撑、科技赋能,护航文化遗产事业改革发展。推动构建与文化遗产资源规模、工作任务相匹配的机构队伍,不断健全政策体系,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充分释放文化遗产事业改革发展活力。强化机构队伍建设。根据文物资源密集度认定文物资源大区、大县,推动落实文物保护单位配置量化标准。推动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开设文物考古本科教育,探索文物全科人才定向培养新机制,强化政策保障,推进文物资源活化利用改革、国有博物馆“三权分置”改革试点,建立健全川渝石窟寺保护传承协同机制。制订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保护利用政策文件,推动建立完善市、区县联动的财政投入机制。推动一批具备科研能力的文博单位纳入科研机构管理。强化数字科技赋能。围绕数字重庆建设,培育文化遗产数字化新业态,开发上线“文化·巴渝文物”数字应用,科学谋划文化遗产保护“一件事”,建设非遗数据库和云上博物馆。大力推进文物保护装备产业招商引资,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创建石窟寺区域性保护研究中心、山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作者系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重庆市文物局)党委委员、副主任)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守护历史,传承文化:哈尔滨市“四普”纪实

哈尔滨市四普办公室

按照国家、省委、省政府关于文物普查工作要求,哈尔滨市积极动员,推动实地调查。对已认定、登记的2014处“三普”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全面复查,同时调查、认定、登记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多措并举、高质高效推进普查工作,扎实推进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截至目前,哈尔滨市已复查“三普”登记不可移动文物1653处,占全市文物总数的82%,调查新发现文物22处,预计于十月末全面完成“三普”文物实地复查工作。

全面复查,摸清文物家底

从方案制定到实地普查,哈尔滨市“四普”领导小组组长、市委宣传部长兰峰高度重视,多次召开全市“四普”工作会议,反复强调“通过对文物进行复查,更新完善文物信息,加强文物保护,挖掘文化内涵,合理利用文物资源。哈尔滨市“四普”工作组充分做好前期准备工作,成立普查指导组,积极动员,对各区、县(市)普查队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和指导,协助各普查队人员数据和识别地图。实地调查过程中,普查队利用无人机对大型遗址和难以到达的区域进行航拍,利用卫星手持终端,对遗址点位进行打卡、拍照,确认文物现状。同时,建立文物信息数据库,将复查过程中收集到的文字、图片、影像等资料进行数字化存储,方便管理和查询。宾县强力推进“三普”档案整理进度,对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进行核对;通河县积极与国内外专家沟通,确保史料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截至目前,道里区、平房区、木兰县、通河县已率先完成全部“三普”复查任务,转向新发现文物调查工作;香坊区、松北区已基本完成复查文物工作。全市18个普查单元由田野调查逐步转入到室内填图与审核阶段。其中木兰县在专业部门指导下,“四普”工作进入成果转化阶段,对重要遗址进行复查研究,开始撰写专业论文。为推进普查进度、保证普查质量,哈尔滨市“四普”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区、县(市)开展督导工作,建立日报督导制度。每日统计9区9县(市)普查数据,及时上报市“四普”领导小组办公室,哈尔滨市文广旅局局长王洪新作为领导小组副组长,每日将数据及时反馈全市9区9县(市)文旅局长工作群,通过每日工作量化,进一步推动全市“四普”督导工作。目前,哈尔滨市“四普”工作组已完成对13个区、县(市)的现场业务指导及督导工作。

上下联动,加快普查速度

从街头巷尾到崇山峻岭,“四普”领导小组多次带队,深入“四普”一线,了解普查进度,解决各区、县(市)普查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在普查过程中,哈尔滨市注重新老队员的有效结合,由专业素质高、综合能力强的三普老队员带队,充分发挥老一辈文物工作者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吸收新队员的活力和创新思维,共同推动普查工作的深入开展。巴彦县普查队返聘具有丰富普查经验的老同志带领新同志,身负重担,日行数十里山路,寻找文物遗址;延寿县由参加过“三普”的老队员带领初次参与普查工作的新队员,“以老带新”锻炼培养新人。此外,哈尔滨市积极与相关部门进行协作,通过与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为文物普查提供新视角、新线索。各成员单位也高度重视,建立合作机制。通河县与各部门联合发函,签订文物保护责任书,开展“县镇村”三级联动。木兰县普查队联合县革

命老区促进会、丹清河林场,多次深入林区开展东北抗联革命文物资源调查认证;方正县携手本地村委会、县史志研究办公室发掘战斗遗址和革命遗址。哈尔滨市通过调动全民参与,向全社会征集文物线索。南岗区、平房区等通过公众号推文,发布文物线索征集信息、制作文物线索征集海报,向全社会征集不可移动文物线索信息;方正县“四普”工作领导小组以正式文件形式向29个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征集文物线索,共征集望江屯西北遗址、大罗密抗联纪念馆2处文物线索。

攻坚克难,推进普查进程

从春夏之交到霜天红叶,哈尔滨市“四普”工作队员行走在深山密林、房前屋后,他们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冰城大地,用心记录每一处文化遗址。面对广泛分布于耕地、林地、山地的古遗址、古墓葬类文物,普查队员们展现出了无比的勇气和担当,他们直面各种严峻挑战,用实际行动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阿城区文物普查队下稀泥沼泽,蹚急流河水,搜寻文物遗址;通河县不可移动文物多分布在深山密林中,山路崎岖难行,普查队员跋山涉水,搜寻古迹;宾县普查队穿行在农作物耕地中,脚掌被坚硬的玉米茬刺伤,却依旧负重前行。面对文物普查时间紧、任务重,文物遗址分布零散、点位寻找困难、位置状态判断不清,专业人才短缺等问题,普查队员们克服困难,利用人工智能和村民向导确认文物基本信息。木兰县采取研读史料、走访调查、勘察遗址“三结合”工作法,聘请搜寻专家向导,考证蒙古尔山三千古吊古人类活动遗址;通河县通过多方面考证,依靠中日史料多重对比,锁定不可移动文物位置,确保每一个发现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并从教育、公安、乡镇文化站等多个领域抽调骨干人员,组建专业队伍,发挥各成员优势,凝心聚力推进普查工作。

调查遗迹,发现文物遗址

从资料研究到实地寻访,为丰富历史资料,延续历史文脉,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文物保护单位体系,全面了解和掌握文物资源的分布及特点。在此次普查过程中,哈尔滨市不仅高效推进文物复核工作,同时也积极开展对新发现文物的调查、认证工作。哈尔滨市新发现了多处遗址和文物遗存。截至2024年10月,在哈尔滨市南岗区、阿城区、双城区、依兰县、宾县、木兰县几个区域内初步锁定了22处遗址。目前正在搜集和固定证据,并邀请专家认证。其中木兰县发现文物单体数量众多,东北抗联第三路军许亨植将军牺牲地遗址初步锁定,从2024年7月下旬开始,木兰县文保中心与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共同开展国家考古项目——木兰鸡冠山东北抗联的考古发掘工作,新发现蒙古山棺材遗址(汉魏时期遗址等一批重要文物遗址。在复查古城址时发现了青铜镂空牌饰、铁制矛头、匕首等文物;阿城区登顶红石砬子时新发现一处包含47个穴窟窿的文物点;延寿县普查队在对石城山张学良剿匪纪念馆遗址进行复查时,发现1处剿匪部队作战战壕。经查阅史志资料,并咨询省级革命文物保护单位专家,初步确定为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单体,这对哈尔滨市文物普查保护研究、增强民众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积极推广,加大宣传力度

从深入群众到线上宣传,为增强公众



宾县新发现遗址考古现场



通河县“四普”进行时



巴彦县山区调查

文物保护意识,促进文化传承,哈尔滨市推出系列不可移动文物科普视频,在公众和新媒体开辟“四普”专栏,及时发布、转发“四普”工作动态,推动公众号等新媒体的宣传报道工作,广泛宣传文物普查中新发现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这不仅增强了市民的文物保护意识,还促进了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哈尔滨市各区、县(市)积极开展文物普查宣传工作,呈现出多样化和特色化的特点。截至目前,哈尔滨市各区、县(市)宣传报道“四普”工作的视频号、抖音号、公众号发布近四百余篇推文。道里区通过进社区、进校园、利用节假日等开展多主题“四普”宣传活动;南岗区博物馆通过招募文物普查志愿者,开展志愿者培训活动,让志愿者们深入社区、学校等场所,发放宣传资料,讲解文物普查知识,并通过制作别开生面的“南岗四普——新闻播报”系列视频,科普“四普”知识、征集文物线索;木兰县推出“十一假期工作特辑纪实”视频,记录普查队员们的假期工作过程。通过全市各区、县(市)的共同努力,哈尔滨市文物普查宣传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文物普查工作的顺利推进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为文物普查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文物普查任重道远,哈尔滨市普查工作队员们将不惧困难,厉兵秣马,砥砺前行。在普查的基础上,加大对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力度,确保文物的安全和完整。积极探索文物的利用途径,推动文化遗产与旅游、教育等产业的融合发展,为城市的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哈尔滨市将严格按照现阶段工作要求,抓住秋收后、落雪前的有利时机,继续推进文物普查工作,确保按时完成普查任务并建立完善的文物资源总目录。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浅谈中小博物馆教育研究工作

马率磊

念等有形或无形、物质或非物质等诸多方面;而教育资源研究就是在尊重其科学、艺术和历史价值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挖掘其教育价值,更好地服务社会和公众需要。教育方式是博物馆做好服务的保障,其是指教育目标指引下,教育者结合资源、环境等综合现状而选择的服务公众的具体途径、方法和手段,其具体形式包括了讲解导览、互动体验、工作坊等;研究教育方式有利于深化博物馆教育规律的认识,推动教育活动的有效、高效,切实满足不同观众群体的需求。观众是博物馆教育活动的主体,深入开展博物馆教育对象研究,有利于了解观众的需求、兴趣和学习特点,为博物馆开展分众化、个性化的教育服务做好准备。教育评价和影响是推动博物馆教育持续发展的保障,不仅是博物馆教育多元目标是否达成的“试金石”,而且也是塑造教育品牌和拉近与公众距离的“加速器”,更是未来博物馆教育发展的“指挥棒”。

因此,博物馆教育研究不同于文物研究,但是与文物研究又有着密切的关系。博物馆教育研究是一个多维度、综合性的领域,是立足于文物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为推动博物馆如何更好地服务“人”提供智力支撑,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又会带动文物研究不断地走向深入。

为何要强化博物馆“教育研究”?

实际上,早在2014年初,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关于开展“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按照‘重参与、重过程、重体验’的教育理念,紧密结合国家课程、地

方课程与校本课程的设置和课程改革目标,设计研发博物馆青少年教育课程。”这为博物馆教育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就是要满足不同层次观众的需求,尤其是满足不同阶段青少年教育的需求,将博物馆逐步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地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而在进一步强调博物馆教育重要性的同时,也指出了加强博物馆教育研究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许多博物馆的教育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样,但是仔细观察,研究之下不难发现,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很多教育活动重复率缺乏创新,“同质化”现象严重,还有些中小博物馆的教育活动流于形式,为了活动而活动,缺乏连贯、关联以及后续提升等等。这些现象不仅影响了观众的文化生活质量,也直接影响了博物馆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这些与我国博物馆教育理论不健全、不完善,博物馆教育者工作理念方法不明确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博物馆人应加强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提升理论水平,从而推动实践优化提升。

同时还应该看到,从某种程度上,教育研究是博物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是促进博物馆事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引领教育工作向前发展的“指向标”,是有效坚持“三贴近”原则的内在要求,更是不断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化需求的重要保证。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博物馆教育而言,科研就是一块“不误砍柴工”的磨刀石,科研就是一把“打开知识宝藏大门”的金钥匙。博物馆人唯有在充分认识教育研究重要性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发挥理论对实践的引领作用,从而推动博物馆教育工作发展。

应如何强化博物馆“教育研究”?

首先,应树立研究意识。

博物馆教育研究并不是一项高不可攀的工作,只要在实施或谋划教育工作过程中勤于总结、善于提炼,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待和处理遇到的问题,就能取得一定的成绩和结果。要加强博物馆教育研究,教育者首先要树立研究意识。现实中不少教育者经常抱怨教育工作没有研究的课题,其实“博物馆教育”这个大的课题下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子课题。史吉祥老师曾说,在博物馆教育中,观众是第一位的。那么不同阶层、年龄段观众有哪些文化、审美、娱乐等方面需求?博物馆能通过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教育内容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博物馆教育工作者应加强观察思考,提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坚持科研的先导性。

其次,要正确处理好三个“结合”。

博物馆教育研究不同于史学研究、器物研究,它是同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且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因而更为复杂。正因为如此,开展博物馆教育研究要处理好三个“结合”。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博物馆教育研究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是一个实践经验总结、升华的过程。众所周知,理论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但是最终还是为了推动实践的发展。因此,博物馆教育理论研究要与博物馆教育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在工作中研究,在研究工作中。在工作中研

究,就是要求博物馆教育者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博物馆教育开展研究,在实际的工作中去发现问题、寻找研究的“课题”,让实际的工作数据为研究提供一手资料,在研究工作中,就是在理论的指导下去做实践,把研究的理论成果及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来,以此推动工作效率的稳步提高、教育工作质量的稳步增长。但是,在具体理论迁移应用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理论的普遍性和具体实践的特殊性,而不能一味地照搬运用。总之,只有重视实践和理论的有机结合,才能最终实现教育实践和科研成果的“双丰收”。比如,邯郸市博物馆在皮影剧社教育活动的同时就十分重视理论的探讨,截至目前该活动已持续七年,受众达到近万人,还获批了两个项目课题,发表了三篇学术论文。

长远与当前的结合。教育课题研究既要解决当前问题,又要解决长远问题,但首先应着眼眼前问题的解决,并同时逐步细化长远问题的分解。比如免费开放以来,不少中小博物馆“门前冷清”,参观者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博物馆首要解决的是如何吸引更多的观众来馆参观,但同时更要考虑策划、研发系列活动,吸引其持续关注,做到既要会“吆喝”又要能“唱戏”。

分散与集中的结合。教育研究是一个内容庞杂而又长期的“大课题”,任何一个人或一个部室都很难以独立完成。因此,研究者需要处理好分散与集中的关系。当然这包括两层含义:从纵向上来说,作为一个研究者在明确科研课题后,要学会分散在不同的工作阶段去分散、分散完成;从横向上来说,作为一个单位,可以集中年度的中心科研课题、中心教育工作,然后将成果再集中到部室。

总之,当前加强博物馆教育研究已势在必行。博物馆教育者应积极探索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推动博物馆教育实践工作逐步迈向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